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三辑）



中国文艺理论 研究论集

ZHONGGUO WENYI LILUN YANJIU LUNJI

李 平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三辑）



中国文艺理论 研究论集

ZHONGGUO WENYI LILUN YANJIU LUNJI

李 平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侯宏堂

装帧设计：丁奕奕 欧阳显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论集/李平著.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3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第三辑)

ISBN 978-7-5676-2722-2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文艺理论—中国—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1900号

本书由安徽高校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资助出版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253)阶段性成果

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论集

李 平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刷：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27.5

字 数：412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76-2722-2

定 价：82.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1945年9月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中文系，1949年12月更名为安徽大学中文系，1954年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72年1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4年10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这里人才荟萃，刘文典、陈望道、郁达夫、朱湘、苏雪林、周予同、潘重规、宗志黄、张煦侯、卫仲璠、宛敏灏、张涤华、祖保泉、余恕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他们高尚的师德、杰出的学术成就凝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

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等4个本科专业，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艺术文化学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所（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语文）、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有1个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有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古代文学），两门国家级精品

课程（文学理论、大学语文）；主办1种省级刊物（《学语文》）。

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现有在岗专任教师82人，其中教授28人，副教授35人，博士55人。2010年以来，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0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8项（含重大招标项目和重点项目各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9项。教师中，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皖江学者3人，二级教授8人，5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走过八十多年的风雨征程，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拥有很多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唐诗研究、古代文论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宋辽金文学研究、词学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研究、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改写。

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

21世纪以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如何继承、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基于这一初衷，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名之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一直出版下去。我们认为，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展现学术影响力。

现在奉献的是第三辑，文集作者既有年高德劭的退休老师，也有年富力强的年轻学者，学科领域涵盖中国文学、语言学、美学、逻辑学等，大

致可以反映文学院学术研究风貌的历史传承与时代新变。

我们坚信，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文学院必将向学界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悠远的辉煌！

储泰松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文果载心 予心有寄

——怀念我的“三好”先生(代序)

2013年国庆节，中国学界的一棵参天大树终于倒下了！我的先生祖保泉教授走完了他93年的人生征程，溘然仙逝！先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心雕龙》研究界的元老，曾为中国学术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在庆祝祖保泉教授90华诞纪念会上，先生很风趣地用三个好来概括自己的一生，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先生说：我一生庆幸自己谋得了一个好职业，选择了一个好专业，得到了一个好妻子。所以我说先生是“三好”先生。

所谓“好职业”，是先生将教书视为最高尚的职业。对于这份职业，先生是敬业的。他进入安徽师范大学后，一直坚持在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的第一线，先后主讲过“现代文选及习作”、“文学概论”、“文学评论”（专题课）、“历代词选”、“文心雕龙”等课程，一教就是几十年，没有教材就自编自讲，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道路。他曾说自己所写的著作，一句话点破：全是教材。在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治学道路上，先生越走越开阔，越走越亮堂，一些教学和科研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并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担任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先生一生致力于师范教育，几十年如一日，精心育人，桃李满天下，不少学生现已成为教育战线的栋梁之才，学术领域的中坚力量。他是安徽

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点的创始人之一，为该学位点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他的带领下，该点研究生教学树立了严格的规范和优良的学风。先生在教学、科研和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2000年6月16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举行“祖保泉教授从教55周年暨80寿辰庆祝会”，在庆祝会上，先生答词说：“只要一息尚存，力求对得起我的学生，对得起我这一生！”“我一定活到老，学到老，力求自己不成为老废物。”

所谓“好专业”，是先生自认中国古代文论是其专业。在这个专业里，先生是杰出的。自1952年进入安徽师范大学，先生就一直致力于《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和词学研究。这三方面的学术研究，基本涵盖了先生重要的古代文论研究成果，也大体反映了他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

先生被学界誉为当代“龙学”重镇，《文心雕龙》研究是其学术生涯中的重中之重。如果从1962年先生发表第一篇“龙学”研究论文算起，他在这个领域已经辛勤耕耘了40余年。天道酬勤，1985年，先生的“龙学”专著《文心雕龙选析》正式出版，该书荣获1989年国家教委颁发的《文心雕龙》教学、教材建设国家级优秀奖。1993年，先生又一部“龙学”专著《文心雕龙解说》出版。该书多次再版，总发行量已逾5万册，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荣获安徽省第三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研究是先生学术研究的专长所在，他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贡献大，具有开拓性。1964年，《司空图诗品解说》正式出版，这是继郭绍虞《诗品集解》（1963年版）之后，现代学者关于《二十四诗品》研究的第二部重要专著，两书一详词语释义、一重意蕴阐释，一为文言旧注、一系白话新译，先后承续，相得益彰。时隔20年，先生又出版了《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一书。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先生又经过近15年的充实、更新和提高，终于将司空图的生平和思想、创作和理论、影响和地位各个方面的研究融会贯通，凝聚成一部综合性的集大成之作——《司空图诗文研究》。该书立论严谨，考证绵密，对一些重点、热点问题更是详加阐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词学研究，堪称先生的看家本领。先生在读大学期间学会了填词，以后便一直将读词、论词、作词融为一体。身为作词之人，先生对名家词的欣赏自能入乎其内，沉潜把玩，从容涵泳；作为词学专家，先生对古今词的理解又能出乎其外，自出机杼，论如析薪。词学研究方面，先生尤役心力的还是清末王国维的词。他曾对王国维留在人间的115首词中的某些佳作作过赏析札记，以此为基础，他在完成《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之后，不顾83岁的高龄，立即打定主意，再写一册笺评王国维词的书，并给书取名《王国维词解说》，与以前出版的《司空图诗品解说》《文心雕龙解说》相呼应。

至于“好妻子”，当然是指师母了！天赐佳人，是先生一生莫大的幸运！他曾深情地回忆说：“1948年11月中旬，我请假回巢县烱烱河结婚。未婚妻吴高项小我三岁，小学教师，头年在她家订婚，今年她来我家完婚。她原是我大妹的同班同学，我也是她哥哥的同级同学，这样，双方都有人通风，就订婚，又‘天作之合’（《诗·大雅·大明》）了。双方相处和谐，及今61年。银婚、金婚，都已过去。这叫什么婚呢？曰：金刚石婚！”

这番话，实为有感而发。先生不谙家务，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均有赖师母悉心照料。我读书时，一天上午去先生家问学，与先生在客厅聊天，师母正好要去菜场买菜，就对我们说：炉子上在烧水，水烧开了你们关一下火，把水瓶灌上。我和先生都答应得非常干脆：好！半小时后师母买菜回来，一进厨房就发现水烧干了，并无奈地说：指望你们就是不行！我和先生都像小学生一样低头不语。

师母不仅在生活上侍奉呵护先生，而且是先生患难中的挚友，学术上的帮手。“文革”中，先生受到极大的冲击！家门口，白色对联，白色横批，俨然如办丧事人家，还被拉到门外马路上，只许面墙站着，白天挨斗，夜里写交代，不吃不睡，精神垮了。一次，先生拧下电灯泡，想触电自杀。师母知道后，抱着他痛哭，并安慰说：不要想不开，我会做小人穿的鞋和衣，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饿死你！先生听了非常感动，终于

坚强地活下来。学术上，先生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从一篇文章到大部头著作，都由师母誊抄后寄出。先生曾对我说，72万字的《文心雕龙解》说》，师母抄的稿纸就有几尺高，重达10余斤。

先生与师母60余年相濡以沫，白头偕老，是一对同甘苦、共患难的好夫妻。在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我看到师母悲伤的样子，心里充满了无限的痛楚，并予以深深的理解。

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讨论。先生不顾年迈积极撰文参加讨论，他凭着对学术的热情和对真理的忠贞，在耄耋之年，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埋首故纸，勤搜遗佚，慎选版本，考证求实，终于在2002年出版了《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一书，“对司空图的诗集和文集作了迄今第一次整体的整理笺校工作”。是年，先生八十有二。这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我总在想，先生晚年参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讨论，使他的学术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和重大突破，但同时也耗尽了他生命的精气。先生的生命是与他的学术联系在一起的，他用生命捍卫了学术的尊严，也赢得了学界的敬意！

我自1988年忝列师门，侧侍先生已达25年，身份早已超出师生关系，先生与师母视我如己出，我则待之以父母。先生不嗜烟酒，两袖清风，谈起学术来却眉飞色舞，口若悬河，注而不竭。20余载对我耳提面命，使我如沐春风，获益匪浅。

先生对学生的爱是无私的，退休后他到院里取报纸信函，常常会到我的办公室小坐一会儿。若几日不见我，便会关心地问：李平哪去了？他见我办公室墙面比较空荡，就将张光年（笔名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书赠他的《文心雕龙·通变》篇赞词书法作品送给我，并说：你当《学语文》主编就挂在办公室，不当主编了就带回家。他知道我主治《文心雕龙》，就将珍藏多年的元至正年间刊刻的《文心雕龙》影印本和开明书店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七册线装本送给我。

先生的大恩厚德，我实在是倾全力而无以回报，只有尽力帮他做一些

文字编辑工作。2005年，我着手为先生编一本《中国诗文理论探微》的论文集，我在编后记里这样说：“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总是希望老师的著作在经过学生的手之后，能够变得完美一点，哪怕是形式上的也好。不知道这个愿望能否实现？但我想，心存愿望也是对老师的一种报答。”书出版后，先生在赠送给我的书的扉页上题曰：“李平大弟为编辑此册辛苦多多，志之存念！八十六叟保泉持赠。”

接着，先生的新著《王国维词解说》完稿，本准备就近给学校的出版社出版，当我得知要收费后，立即制止了此事。我知道先生晚年的生活并不宽裕（但先生每次捐款都很积极），就联系我在省城一家出版社当总编的同学（也是先生的学生）帮助出版此书，结果不仅没有收费，还付了稿酬。先生在书的后记中又提到了我：“在校内，老年、中年的同行老弟赐助的有陈育德、李平二位，他们时来舍下叙心，得知我又立题撰述，便携来多种资料，供我长期查阅。这种友情的温暖，增强了我撰稿的毅力。”

2009年，我和同门师兄弟着手筹办《文心雕龙》第十届年会和先生90华诞纪念会，同时编辑出版了《风清骨峻——庆祝祖保泉教授90华诞论文集》。台湾王更生教授与先生交谊深厚，并于先生90华诞时亲临会场祝贺，两位大师见面拥抱的场景，令与会者深受感动。未料短短数年，两位“龙学”泰斗相继辞世，令人不胜唏嘘，大有曷可瞻依之叹！

先生晚年最念念不忘的则是其选集的编辑出版问题，这时，他不仅行走不便，写字也很困难，而且听力极差，难以交流。我想这可能是我为先生做的最后一件文字编辑上的事了，所以也是倾尽全力而为之。从内容安排、联系出版、校对复核、选择照片、参考装帧到文字修饰，甚至捉刀代笔，无不亲力为之。先生也一再让我在书中表明我付出的辛劳，但我坚辞了。我能为先生做的不就是这样的事吗！而我做这样的事还有什么目的吗！还需要表明什么吗！一切准备就绪，定版付印后，我最担心的还是先生能否亲眼看到这部选集的出版，因为我看到先生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连一向沉得住气的师母也数次问我书何时能出来？我只好一次次催出版社，催我的老同学。好在苍天有眼，2012年深秋，老同学亲自送书来了。

当我陪老同学一起将5册精装本《祖保泉选集》样书送到先生家时，我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先生80华诞后，我在一篇纪念文章的结尾表达了心愿：“我们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我们也热切期盼2010年再为先生庆贺九秩寿辰！”这一愿望实现了。先生90华诞时，我也曾想过2020年若能再为先生庆贺百年华诞，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岂料天有不测风云，2013年10月1日14时11分，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的愿望也被定格在那一刻，再也无法实现！

哲人其萎，山颓木坏。怆惋莫名，曷胜悼怛！先生道德文章，宇内同钦。先生虽逝，风骨长存；百龄影徂，千载心在。先生遗志，吾党当共效云门之伟业也。

末了，我还想澄清一件被传得有些玄乎的事。先生生前曾对一些人讲，他有一件遗嘱藏在我的电脑里，也不时有人问起我这件事。这次先生病危期间，师母电话里也提到此事。其实，这是先生2002年填的一首词，取名“遗嘱”，让我打印一下。这以后，我的电脑换过好多次，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份遗嘱的电子版了。原件我记得是珍藏起来了，这次师母提到此事后，我立即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可怎么也找不到。没想到，就在今天下午，我在书房一个文件袋里突然找到了这份遗嘱。现附录于此：

满江红·遗嘱

来去由天，今去也、尘缘已了。容暂睡，此行无憾，口边含笑。
烦厌计文虚粉饰，何须套语空旌表。更革除追悼老陈规，除烦扰。
烧了后，灰皎皎；投逝水，归玄窞。劝家人旷达，养生为好。满壁图书
遗后辈，一生心血传家宝。拣其中、非属我私藏，都还掉。

2002年8月底

这份遗嘱既体现了先生“无营无待、得大自在”的豁达心态，又反映

出先生体贴家人、公私分明的性格特征。先生逝世后，师母及家属遵从其遗愿，丧事从简，不设灵堂，故我无以致赙仪。遗爱之嘱，令人益叹先贤之有道也。聊以此文，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2013年10月15日

（本文曾以删节形式发表于《芜湖日报》2013年10月23日第5版，又全文发表于《文心雕龙研究》第11辑。）

目 录

20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述评	1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综论	21
20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57
中国古代乐论的《易》学渊源	86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解读	112
静坐养生与宋明诸儒的读书治学活动	129
论宋编宋诗话的文献学价值	
——以《诗话总龟》《茗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为例	149
论《周易》与《文心雕龙》的关系	167
论《文心雕龙》的体用之道	203
《神思》创作系统论	245
“养气”艺术功能论	274
王利器“范注”订补考辨	307
范文澜注“仲宣躁锐”“仲宣轻脆以躁竞”疏证	323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孙云”辨正	343
《文心雕龙·宗经》“铭”字复见校勘之反思	
——从范文澜校注前后变化说起	381
《文心雕龙》黄批纪评辨识述略	407
后 记	421

20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述评

“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学科，大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在近80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大致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中，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为前期研究的高潮，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为后期研究的高潮。

—

近世学者中，梁启超是较早运用资产阶级新观点、新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清理、研究的人。因而，他被视为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开山者。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编有《中国文化史稿》讲义，这是国内高等学校关于这门学科的首门课程和首出教材。然而，此书的内容主要是论史学，所以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时，便更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此后，梁启超又立志编写一部规模宏大，包括“文艺军备、农业商市、工业美术、戏剧歌曲”等25类内容的真正的《中国文化史》。这真是“骈罗并举，竟委穷原，杜郑以来，无斯鸿著”，再“济以新识，运以眇笔，杀青之后，必无古人”。只是全书“综摄既多，钩纂匪易，体大思精，骤难卒业”^①。而作者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

^① 柳诒徵：《中国史学之双轨》，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耗其精而荒其业”^①，加之晚年病魔缠身，因此只留下一篇《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和已撰成的《社会组织篇》，便撒手而去，《中国文化史》遂成为“广陵散”。

梁启超把文化看作是精神与物质的二层次结合体，是一定生活方式的社会活动的完整过程。这就决定了他的文化史研究对象既要包括学术思想和文艺作品及其与特定社会和传统的关系，又要包括被狭义文化排斥在外的日常生活方式、生产机制、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等。他晚年撰写《中国文化史》正是从“社会组织”入手，分析了原始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母系与父系”，并以发展的眼光考察了中国古代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中国文化史》以《社会组织篇》作为开端，正表现了梁启超的卓识。因为各种其他文化现象皆以社会组织为基础，且与社会组织关系密切：“语言的发达最有赖于社会，宗教信仰也须有社会的条件，经济生活须赖社会上的协作方能成功，知识技术的发明须赖社会上的传播方能改进，艺术创作的动机也不是只由于个人的自赏而有赖于社会的共鸣。”^②这样看来，《社会组织篇》实际上是梁启超原拟撰写而又未能完成的整部《中国文化史》的背景篇，其意义十分重要。

这以后，不少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进入第一个高潮期，出版专著30余部。其中主要有：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1924）、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1928）、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1931）、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1931）、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32）、丁留余的《中国文化史问答》（1933）、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上册1935、下册1937）、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1936）等。这些著作中，学术价值较高，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柳诒徵、陈登原和杨东莼的文化史著作。

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从1925年起在《学衡》杂志上陆续发表，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页。

^②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6页。

1932年由南京钟山书局正式出版，以后多次再版，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再次重印，流传甚广。作者本着“求人类演进之通则”“明吾民独造之真际”的著述宗旨，试图通过《中国文化史》一书，探索中国历史的真相，评析中国文化的得失，进而回答“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一类重大的文化史问题。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该书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1.文化史研究的内容。柳氏赞同梁启超对文化史内容的规划，他的《中国文化史》内容包括了人种家族的起源、典章制度的建立以及宗教兴衰、诗文发展、学术流派、工艺进步等诸多内容。实际上，他是把文化看作是人的创造力的凝聚，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物。这种观点是深刻的。因为创造是文化之母，人类能对自然界宣告独立，开拓出所谓文化领域，全靠有了创造的意志和力量。作者在书中正是以人类的创造活动为选材标准，并使之成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2.文化史的分期。柳氏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划分为三期：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这种文化史划分的标准以中国文化发展的“蝉联蜕化”为依据，既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量与质的变化，又显示了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性。

3.进化的文化史观。柳氏在《中国文化史·绪论》中说：“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①这段话告诉我们：柳氏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历史观是19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进化论思想。这样，作者就超越了旧史学的局限，为探索中国文化史的规律奠定了基础。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①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